

经济学者文库

陈荣辉·著

经济开放与产业发展研究

Jingji Kaifang Yu Chanye Fazhan Yanjiu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Kuaiji Chubanshe

经济学者文库

经济开放与产业发展研究

Jingji Kaifang Yu Chanye Fazhan Yanjiu

陈荣辉·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开放与产业发展研究/陈荣辉著. —上海市: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12

ISBN 7-5429-0689-5

I. 经… II. 陈… III. 对外开放-影响-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498 号

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出版人 陈惠丽

新华书店经销

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56 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定价: 16.50 元

第一章

导言：国际经济多元论与国际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一、国际经济史简述

国界线的圈定从来就不被赋予经济活动延伸的临界线的涵义。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单位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了国际经济多元化的立论基础，同时也是对旨在弱化或消除国内经济条件制约并促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国际经济活动开展的必要性的最好阐释。国际经济是指一国或一地区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面向国际市场所开展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根据国际经济活动所介入的国际分工领域不同，可以进一步将其具体划分为商品贸易、资金融通、技术转移、劳务贸易、信息交流、人才交流、旅游、房地产等各种不同的活动类型，概括地讲，主要有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三种最基本的形式。而每一种基本形式，根据其中所界定的产品或要素在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间流动的双向性，于是有流入和流出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即国际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国际投资包括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国际金融中的国际收支则包括国际收入和国际支出。以下分别对其发展演变史进行简单的追溯，同时概述了中国的国际经济交往史。

（一）国际贸易史

国际贸易活动是国际经济活动最为古老的形态。根据传统的

国际贸易理论的解释,国际贸易是指发生在位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各个独立的企业之间的商品(包括技术产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一般认为,在公元4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就已经成为了欧、亚、非三大洲的贸易集散地,而国际贸易活动的真正开始远早于这个年代,自从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先后进入奴隶社会,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便初见雏形。到了公元11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城市的兴起,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发展成了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和伦敦等欧洲大西洋沿岸城市成为国际贸易商业城市则是在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之后的事了,这种格局一直沿续到本世纪初期。

20世纪初期以来,国际贸易活动由于国际投资活动的兴起而失去了以往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一枝独秀的地位。战后的国际贸易则伴随着国际投资活动的深入开展而在贸易内容和贸易方式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制成品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同时,部门内贸易和跨国经营企业内部贸易的开展使传统的国际贸易概念内涵也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同一部门或同一企业内部的国际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活动的一项新的重要组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通常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始于秦而兴于汉。张骞通西域成为西汉年间对外贸易的典故,而以罗马帝国为主要贸易对象,东自西汉的长安、横贯亚洲大陆、西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则更为举世瞩目。到了唐朝,广州、潮州、泉州、扬州成了主要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世界闻名的四大商港。宋朝年间,丝织品、瓷器发展成为古代中国的两大出口支柱商品。明朝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是以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为主要标志的。自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大力促进了当时的对外贸易活动。之后,清政府日益衰微,中国开始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贸易活动的开展逐渐丧失了主动权。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外贸易活动开展

上,由于 50 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与前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简单的易货贸易,直到 1978 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 10%。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精神指导下,中国开始摒弃以往那种关于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必受国际剥削的传统偏见,对外贸易活动才如火如荼地展开。数据显示,自 1979 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总值已由 1980 年的 182 亿美元上升至 1998 年的 1838 亿美元,同期进口总值也由 200 亿美元上升至 1402 亿美元。

历史地看,国际贸易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和不断扩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 15 世纪,英国率先进行对外扩张,通过国际贸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在 1850~1913 年的 63 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 10 倍,同时期里,世界贸易量也以 10 倍的速度增长。列宁曾经指出,在当时,“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①在 1913~1981 年的 68 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 13.5 倍,同时期世界贸易则猛增了 16 倍,对外贸易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 80 年代初期就已经达到了 20%。进入 80 年代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1994 年全球贸易第一次突破 4 万亿美元,达到 4.09 万亿美元。1997 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 4.1%,贸易增长速度为 9.5%。贸易对于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朝纵深方向发展。世界银行 1987 年提供的报告就曾经表明,曾经创造过世界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其出口依存度都相当高,其中,新加坡为 118.4%,香港地区为 86.5%,韩国为 34%。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6 页。

（二）国际投资史

国际投资活动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国际投资是指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资本或资金及其他各种生产要素的国际间转移行为。根据投资行为方式的不同,国际投资分为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两种。国际直接投资牵涉到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拥有,而后者则没有。国际投资活动的产生,在现有的经济文献中,大多将其追溯至 19 世纪的 60 年代,一般认为,开创这一活动的鼻祖是 1865 年在美国纽约爱尔班地方的苯胺工厂中持有股份的德国拜耳公司。国际投资活动最初产生的原因,根据列宁的解释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资本的形成,他曾经深刻地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获得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国家去。”^①到了 20 世纪初,随着许多落后国家已经纷纷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经具备,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已经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剩资本”大量形成,因而,“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②,国际经济活动开始进入了商品国际流动与资本国际流动并重的年代。二战以后,随着以生产国际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到来,国际投资活动中以企业跨国经营为主题的国际直接投资成为这段时期国际投资活动的核心内容,投资的行业选择日益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重心,投资的流向更加强调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渗透。

中国参与国际投资活动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当时是以利用外资为主要内容的。1887 年,当时的中国铁路公司鉴于国内“官

①、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83 页。

款难拨”、“商股维艰”，承建铁路财务不足的困难，向怡和洋行举债 637 000 两钱款，年利息为 5%。自此，中国开始被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中。辛亥革命以后，如何利用外资来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成了当时议论的一大建国方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利用外资问题拟定了三种具体方式，即“借资兴办”、“华洋合股”、“定以限期，拟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利用外资方面，50 年代主要采取政府贷款方式，之后直至改革开放的 1979 年之前，中国一直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工业化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事业迅速发展，利用外资方式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等借贷方式、建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等外商投资方式等，其中，利用外商投资额截至 1997 年，在 18 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实际到位 2 657 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进行实质性展开的，在这之前只进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工程承包等低级层次的尝试。自 1979~1996 年底，经中国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已达 5 045 家，中方投资金额 57.2 亿美元，虽然对外投资规模不是很大，但已是世界上第八大资本输出国。国际机构仍然认为这一官方数字偏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1996 年 12 月 27 日发表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政府 1989~1995 年共批准了 180 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的海外投资。可以肯定的是，总部设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者。

国际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曾经颇有见地地指出，倘若允许资本如同商品一样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将不仅有利于资本所有者，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消费者，人类社会将会因此获得更大的福利。当前，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已经成为生产要素转移的典型代表，是导致生产过程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途径。经济发达国家在

为过剩资本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输出资本,同时通过利用外资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上的强强联合。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引进外资以带动出口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在进行对外投资的尝试以争取分享到世界经济更大的利益,通过建立一套资本输出输入的双向循环良性机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之中。

(三) 国际金融史

国际经济活动中有形的商品贸易、无形的劳务贸易、资本的借贷等都必将引起国际间资金的移动。所谓国际金融就是指这些国际间资金移动现象。

历史地看,国际金融的最早形成是建立在国际贸易开展的基础上的,然而它比国际贸易要年轻得多,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在 17 世纪随着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形成的。在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生产方式里,国际贸易的开展是以简单的易货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这其中并未有国际金融业形成的基础。

国际金融雏形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 5 世纪在欧洲沿海口岸的“货币兑换业”的开展,不过,它只是一种在邻国之间进行的原始的、直接的货币交换。在公元 15 世纪,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随之出现了“货币经营业”即“经营货币的商业”,其代表是意大利威尼斯银行和米兰银行较早经营的国际结算和国际汇兑业务,然而它仍是限于地区性的交易。1694 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国际金融业的诞生。它不仅开始集中经营全世界范围的国际结算、国际汇兑和国际信贷业务,而且以低利率支持了厂商和贸易商业务的开展。由于英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伦敦很快便发展成为国际结算中心,进而因为英镑具有了“世界货币”的属性,又进一步

支持它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国际金融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关于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制度的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和储备资产的供应等问题的解决一直成为一项核心的任务,因而,各国按照某些标准或根据某种国际协定对上述几个问题所作出的安排、所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也成为了我们考察国际金融发展史所必须触及的关键内容。在17~18世纪英国所实行的金银复本位制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雏形,之后,在1880年(或说是1897年)开始在国际间形成了一种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促进当时的世界生产发展、保持汇率稳定、自动调节国际收支、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协调各国经济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一战前夕方告解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货币秩序的维持主要靠一种脆弱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以及国与国之间小范围内的货币协定来勉强支持。1944年,经过44个国家的共同商讨,一种以“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为支柱的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成立。在这样一种固定汇率制下,尽管存在着以美元为中心的根本缺陷,但是这还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在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机频繁爆发,这一体系宣告解体。之后,浮动汇率制开始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占支配地位的汇率制度。

当前,随着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际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已经基本上独立于国际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运行框架之外,资本流动和外汇交易的规模日益膨胀成为了国际经济活动的另一主题内容。据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80年代末所作的分析,世界外汇交易额已经以25倍于世界贸易额的规模在繁忙运行。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每天金融交易达5万亿美元,其中与生产贸易活动有关的不足

2%，98%以上属于金融系统的自我循环。另据统计，全球股市市值约 20 万亿美元，而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却达 100 多万亿美元，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倍多。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货币改革问题所展开的斗争自 70 年代以来从未间断。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问题成了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三大问题，对这三大问题的妥善解决成了一种新的、公正的、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以促进自身开放经济的发展。在 1996 年 11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 1996 年 12 月 1 日起，中国将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款的义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从而，在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的建设上又迈进了一步。另外，在 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宣告人民币不贬值，外商金融机构纷纷进驻并有一部分机构开始被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业务开展的另一有力证据。截至 1998 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已经达到 1 450 亿美元。

二、国家利益与国际合作框架

（一）作为经济单位的国家

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体系中，经济思想大多阐述于哲学、法学和神学的著作中，能够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粮食、衣物、房屋等消费品被看作是真正的财富，利益的概念和利益的获得与追寻在当时甚至还未能进入人们的朦胧意识中。

在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瓦解之后，伴随着商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以及 16 世纪初期美洲银矿的发现，人们彻底改变了财富

的观念,表现出对黄金的狂热和对货币的渴望,流通领域被视为财富的获得路径,商业是致富之源。重商主义者在此基础上开始对国际经济学进行了最早的理论探讨,作为经济单位的国家的利益获得是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重商主义者的研究是表象化的,其政策主张也十分简单,即建议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对出口的鼓励和对进口的限制,从商品的国外流通的贸易盈余中获得贸易收益。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继续对作为经济单位的国家的经济利益的获得进行特别强调,与重商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反对对国家的国际经济交往进行行政干预,主张将国民经济集中在比较利益的活动上,从而以效率的提高来增加贸易收益。

现代经济学者和国家经济决策者已经很少有人会再对作为经济单位的国家的国际间经济相互依存问题感到生疏,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人们借鉴并合理吸收了上至大卫·休谟的“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下至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米德等近现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主张,对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国家利益获得问题继续深入研究。这其中出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意识倾向:(1) 对国际交换与国家利得的概念内涵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扩充与完善。商品的国外流通即贸易不仅不是国际经济交往内容的全部,也不是国际交换内容的全部,运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工具,人们考察了外部经济交换对国内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全面影响,运用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则剖析了各种国际交换活动与国家经济活动如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水平、货币和财政政策等等之间的内在关联。(2) 更加注重政府政策的相互依存。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引起政策制定的相互依存,即便这些国内政策我们无法从内容和形式上领悟到它的对外性质。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政府政策的制定对外国人的利益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对于外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密切关注程度却是与日俱增,并据此调整、修正自己的政策内容。政策的相互依存引导出的新话题是

对一个以法律、惯例或协议为主要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的国际制定的重要性的特别强调。再者就是必须更加注重政府的作用。政府政策是有效缓和各种国际因素所引发的国际冲突的最终依托,同时也是对外国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经济运作中的外部扰动进行抵制或消除的有力手段。

(二) 经济行为的检测标准

大多数经济学者们偏爱数量分析手法。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则习惯于用 N 个国家、 M 种商品以及其他种种数量化约定来建立起复杂的模型。大卫·李嘉图用两个国家和两种商品的假定归纳了国际贸易的双方获利原则,麦克道格尔和肯普则采用了形式完美的几何分析图展示了两个国家之间资本国际流动的综合损益情况。但是,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经数学严格量化并且认定对经济交往双方都有利的经济活动类型并没有如同预测的那般蓬勃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有它内在的触发机制,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双方有利并不意味着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最优选择。

对于经济行为的优劣检测,国际经济学领域遵循与其他经济学领域一致的标准:

(1) 关于公平问题。国际经济交往如何进行国内经济利益个体与国外经济利益个体的分化与重组?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否符合各国各自业已约定成规的“有利”原则?

(2) 关于效率问题。国际经济交往如何影响一国的资源配置并将配置的选择领域扩散至国际?这种配置格局是否同时有利于各参与国的系统开发与利用的最优状态的接近或达到?是否与它们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初始意愿相吻合?

(3) 关于稳定问题。国际经济交往的经济风险传递及经济风

险防范机制如何？对本国的就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贯彻有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4）关于增长问题。国际经济交往与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程度如何？对资本积累、产品及要素市场的扩张、产业结构的变动有哪些影响？引进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生态平衡问题、民族工业保护问题等，必须如何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必须区分具有不同利益分配格式的不同国际经济交往类型，以便分别探讨其检测标准适应情况。具有对立利益的国际经济交往，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引进潜在利益概念，赠予与援助不能归入这一类型，剩下的只有掠夺和侵占，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不是合作，因而也无法寻求其合理的合作框架。具有对等利益的国际经济交往最能够同时符合各参与国基于不同立场的检测标准，合作性战略是容易寻求的，具有约束力的强制性的协议，用于规范交往行为，不在于督促其实施。具有混合利益的国际经济交往，双方有相容利益，但存在着利得不均衡特性，符合了一方的经济行为检测标准，于另一方却在诸多标准上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下，合作会出现一些困难，双方就如何重新建立利益分配结构问题而争吵，经济实力的威慑乃至政治力量的介入也经常被诉诸。

（三）国际经济交往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

我们正在感受到一种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势头。世界市场的商品国际化阶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转入资本国际化阶段，然后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进入了生产国际化阶段。然而，就在最近 10 年里，信息革命已经再度更新了世界市场的时空概念，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被快速推进。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企业无国籍化的概念也开始在学术圈中被认为是一个重要概念。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西方学者沃斯坦(I. Wallerstein)等人的世界

体系论的观点。这一理论认为,事实上,20 世纪以来全世界已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每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只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世界体系的制约,这个体系中的成员国分“核心”、“半边陲”、“边陲”三个等级,并各自履行着不同的经济职能,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的机能较强,因而其影响世界并增进自身利益的机能也较强,其结果是强化了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等级差异,西方世界将永远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伯格森—萨缪尔森方程式的社会福利函数极大化,从而通过高水平的福利使其国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多元化格局同时诠释了经济全球化的非同质化特征。在世界市场中,要素的流动和集聚以及利益的重新配置的不均衡性是普遍存在的。由此所引起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与冲突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沃斯坦等西方学者的“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化假定。经济的全球化将是一个充满合作与斗争的进程。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的加强无法掩盖作为经济单位的国家的经济利益多元化事实。“核心”地位国家的“较强”机能的发挥所形成的霸道力量不可能成为经济国际化方向的决定力量,各个国家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面对经济自我健全与自我发展的严肃课题都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

三、对经济主权的挑战

国际经济交往对经济主权的挑战早而有之。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殖民主义时期,当时的美国海军少将巴特勒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在 1914 年我曾帮忙使海地和古巴成为花旗银行获得收益的颇好的地方,曾帮忙布朗兄弟公司国际银行部扫清了尼加拉瓜的障碍。在 1916 年曾帮忙美国糖业利益集团发现多米尼加共和国,在 1903 年帮忙使联合果品公司在洪都拉斯成为‘合法’的

……”^① 德籍波兰裔学者卢森堡因担心民族自决会导致经济上同宗主国相决裂，从而使殖民地的经济发生“混乱”，甚至断然否决了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力。在他们看来，国际经济交往中宗主国对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主权的践踏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这种理论的错误性很快被二战以后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揭示，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恢复国家主权之后，走上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而且，它们并不拒绝经济开放，不拒绝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交往活动，当然，它们仍然面临着外来经济对本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问题。

新时期里，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国际经济合作在两层意义上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感受到了这种挑战，一些发达国家也体会颇为深刻。70年代里，美国著名学者金德尔伯格发表了一本名为《跨国公司入侵》的新著，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民族经济主义的大争论。华尔街著名金融家费利克斯·罗哈廷在1988年的一次演说中甚至提醒人们：“我们发表独立宣言200多年，美国已经失去了一个独立强国的地位。”^②

对经济主权的第一个挑战来自于受外部经济势力操纵的院外活动力量。国家经济主权的表现之一即以集中的形式反映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谋求最大的本国国民利益。但是，外国的经济势力只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感兴趣，采取非正式的、超官方的交换形式和国家间的交易形式，在民族国家政府内部寻找说客和代理人，通过院外活动的力量侵蚀主权国家的安排社会偏好的独立性，减少对本国国民利益的追求，也即增加了外国经济势力的利

^① 转引自南开经济研究室：《跨国公司剖析》，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页。

^② 费利克斯·罗哈廷：《重建美国独立》，载《纽约书评》1988年2月18日，第8页。转引自格里克曼等著，刘谟英等译：《新竞争者——外国投资者正在如何改变美国的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益。在今天的国际经济交往中,跨国贿赂、劝说与资助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它被某些人看作是软化国家政府和官僚机构“独立安排”过程中僵硬态度的一种有效的手段。《纽约时报》1987年2月8日曾经载文报道,尼桑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出于不满美国当地的吉姆·萨塞参议员支持的一项国内草案,从而对他的共和党政敌增加了赞助。经济制裁、撤资威胁甚至寻求母国政府外交干预等手段也经常被一些国际商人和跨国经营企业所动员,以此要挟当地政府按照它们的意愿行事。美国学者对此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对外国在美直接投资关注的加强,担心外国投资者可能支配美国政府和国家的担忧与日俱增。”^①

对经济主权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政府的经济战略目标的设定与外商企业利润追求过程中所存在的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另一主要表现则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使积极影响或直接规定了一些经济过程的发展,以及对一些经济过程作了某种进一步的限定。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外国贸易商或厂商在与本国企业进行国际经济交往时对这些影响、规定或限定的贯彻是具有惰性的,有时甚至是坚决排斥的,一些实力雄厚的外商企业更是如此。金德尔伯格1969年在《美国在国外的企业》一书中就曾经指出:“国际性公司不存在需要它忠于的国家,它在任何国家都随遇而安。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单位影响将会越来越小。”而巴尼特和米勒在1974年出版的《向全球扩展:跨国公司的力量》一书中也指出,国际化经营的经济实体“正在通过对生产技术、金融资本和市场这三个经济生活的基本资源加强控制来改造世界的面貌,生产过程越来越置国界线于不顾。”外商企业的这种独立于当地经济主权之上的相对独立性,在近年来的发展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学者林昇—1989年

^① 格里克曼等著,刘谟英等译:《新竞争者——外国投资者正在如何改变美国的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